

国别与地区

阿拉伯巨变的文化审视

薛庆国

〔摘要〕 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巨变浪潮,是由阿拉伯民族面临的深重危机酿成的。仅从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的角度分析阿拉伯危机依然不够,还应认识到,阿拉伯思想与文化中存在着诸多严重弊端,这是种种危机的深层原因。阿拉伯巨变迄今为止的诉求主要局限于政治层面,并未冲击思想与文化中各种深层问题,因而其意义和价值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原教旨主义、宗教极端势力、宗派主义等阿拉伯社会的痼疾也于后巨变时代在民主的旗号下呈盛行之势。阿拉伯知识界已开始反思这场巨变的局限性和诸多问题。阿拉伯变革的走向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前景并不令人乐观。

〔关键词〕 阿拉伯巨变;阿拉伯危机;深层原因;文化反思

〔中图分类号〕 D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1)05-0062-66

星星之火——突尼斯失业青年布瓦吉吉自焚点燃的火焰,短短数月内便在整个阿拉伯大地燎燃。这场阿拉伯巨变来势之猛,能量之大,波及范围之广,为世人始料不及,甚至超乎最富想象力的国际问题研究者的想象。然而,这场似乎出人意料的巨变其实又早有预兆。如何客观评价这场举世震惊的巨变,预测变革的前景,展望后变革时代阿拉伯世界的走向,是政界、学界极为关注并争议不休的难题。本文试图从文化角度切入,为求解这些难题提供若干线索。

一、阿拉伯危机的文化与思想根源

无疑,正是阿拉伯民族当今面临的深重危机,引发了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巨变浪潮。这轮巨变兴起至今,学界对阿拉伯危机的表现及其缘由不乏剖切的分析。一般认为,阿拉伯巨变的原因是独裁统治丧失民心,经济发展长期受挫,社会问题日益严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以及世界金融危机祸及阿拉伯国家,国际霸权主义加重阿拉伯人的屈辱与悲愤情结,等等。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因素固然是阿拉伯危机的直接原因和外在体现,但仅从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的角度分析阿拉伯民族面临的危机依然不够,还有必要从文化与思想角度深刻审视阿拉伯危机的根源。实际上,近代以来,阿拉伯思想界一直不乏严肃批判本民族文化与思想中积弊痼疾的有识之士。当代许多知识分子更是疾呼:观念与思想的落伍,是阿拉伯社会落后的主要原因;历

史与文化的弊端,是阻碍阿拉伯民族走向未来的根本性障碍。一些受过现代先进思想洗礼的阿拉伯知识分子,能清醒、冷峻地审视阿拉伯民族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并且敏锐地意识到其症结之所在。综合他们的观点,可以看出阿拉伯文化与思想存在以下弊端:

1. 具有膜拜权威、压抑个性的专制主义倾向。传统的阿拉伯社会是典型的父权社会,它以家族、部落为本位,父亲、族长在家庭和部落里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君王更被赋有“真主在人间代理者”的神授地位。人们往往将“父亲”与“君王”视同“神”,因为在一个信奉至高无上之神明的宗教氛围里,“父亲”、“君王”与“神”之间是有着某种微妙联系的:对神的绝对权威的信仰,往往会助长对君王和父亲权威的顺从;反之,对君权和父权的绝对顺从,自然也会巩固对神的信仰。对权威的顺从与膜拜,与对神灵绝对权威的信仰纠缠在一起,这为专制主义在阿拉伯社会大行其道提供了沃土。缺少合法性及民意基础的执政者垄断政治权力,还造成了宗教原教旨主义垄断宗教解释权的后果。最终,专制统治与宗教极端主义结盟,加深了社会危机与人民大众的不幸。

2. 神本主义、宗教蒙昧主义盛行。作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核心,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宗教,而且是一整套包罗万象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体系,对广大穆斯林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生活习俗,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不可否认的是,当今伊斯兰世界不少人对宗教的

理解,在本质上依然没有走出中世纪之囿。一些学者不无见地地认为:阿拉伯思想史上的最大遗憾,莫过于以阿维罗伊(Averroes,即伊本·鲁世德)和穆尔太齐赖(Muatazile)学派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被以安萨里(Al-Ghazali)为代表的较为保守的正统经院教义所取代。正统的经院哲学将伊斯兰教支撑到现在,而基督教世界在新教革命和文艺复兴后却已突破了自己的经院哲学。于是,从那时起,西方继续前进,而伊斯兰世界却在原地停留。当代,伊斯兰教在阿拉伯社会的实践也面临诸多问题。不少穆斯林未能从整体上把握伊斯兰教的精髓,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认识失之偏颇。正如当代阿拉伯著名诗人、思想家阿多尼斯(Adonis)所言:“宗教原教旨主义所描绘的阿拉伯文化和阿拉伯生活的‘图景’,不仅是对这一文化的歪曲,更是对阿拉伯人在所有领域都有所创造的一段伟大历史的蔑视和侮辱。”^[1]由于宗教蒙昧主义的消极影响,科学思想在阿拉伯世界远未深入人心,即使在科学工作者中间也不例外。学者穆斯塔法·希贾兹(Mustafa Hijazi)认为:“在许多人的实践中,科学不过是一件衬衣或外套,在读书、实验或讲课时穿上,在其他时候可以脱去。”^[2]总之,阿拉伯世界保守、落后的宗教观念,阻碍了科学、民主等现代价值观在阿拉伯世界的接受。

3. 对作为“他者”的西方缺乏理性认识。在过去不久的20世纪,阿拉伯世界与西方的关系错综复杂。始于19世纪初学习西方的思潮,在20世纪前半叶依旧盛行。二战以后,随着被西方殖民的阿拉伯国家纷纷独立,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也曾在阿拉伯世界风靡一时。然而,20世纪中叶以后中东地区经历的一系列事件,给地区的思想演进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1948年以色列宣布立国,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惨败,20世纪90年代初海湾战争的爆发,新世纪以来巴以和谈的受挫,“9·11”事件后阿拉伯人遭受歧视和误解,美国执意发动师出无名的伊拉克战争,等等,都加深了阿拉伯民众与西方的隔阂。值得一提的是,阿拉伯民众对西方及以色列的“抵抗”,还从政治、军事领域延伸到文化、宗教与思想领域。为数不少的民众不但厌恶西方的政治与外交,而且对源自西方的思想及价值观表示怀疑乃至拒斥,因为西方——特别是美国——支持阿拉伯的敌人以色列。以色列似乎成了一个符咒,左右了许多阿拉伯人对西方的理解。由于这种心态作祟,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阿拉伯世界很多倡导理性、科学、民主、自由等现代价值的有识之士,都曾遭受过来自多方的诽谤与干扰。一

些知识分子片面强调民族“身份”或“特性”,有意无意地排斥西方现代先进价值,思想趋于保守与封闭。

4. 缺乏客观、理性的历史观。现当代许多阿拉伯知识分子都意识到:阿拉伯文化具有明显的“尊古”特征。有人认为:“阿拉伯民族受过去的影响,甚于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在阿拉伯世界,过去的权威不仅表现为它是代表民族特性的基本准则,而且还以尚方宝剑的形式粗暴地强加于人……人们膜拜过去,把过去视为未来的最佳典范。”^[3]还有人指出:“在伊斯兰阿拉伯思想领域,因袭前人的思想仍然排斥理性思维,仿效依然阻碍着创新,古旧依然在同现代搏斗。”^[4]历史经验表明:过分“向过去倾斜”的民族,往往缺乏革新与创造的原动力;而赋予历史虚幻的光环,则无法客观地认识历史,以史为鉴,获取有裨于现实的经验与教训。

5. 宗派主义思想根深蒂固。由于历史、宗教、文化、地理等原因,阿拉伯国家大都是由不同教派、种族、部落、氏族组成的多元社会。由于国家、社会的概念尚未深入人心,许多人将自己所属的族群利益置于国家与民族利益之上,以亲缘关系的感情和宗派习俗取代法律、公理与国家认同;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也往往以宗派的亲疏决定一切。这种宗派主义不仅损害了国家的法律与制度,而且也阻碍了一个健全国家应有的公民社会的建设。阿拉伯有识之士对于宗派主义的危害有着深刻认识:“毫不夸张地说,宗派主义是阿拉伯国家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它是国家与祖国身上深深的伤口,它永远携带着内战的种子,是外国干涉可能依赖的支柱,它会削弱政治反对力量,并几乎宣告民主不可实现。”^[5]

6. 男尊女卑、歧视女性的痼疾难以消除。早在19世纪末,阿拉伯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卡西姆·艾敏(Qasim Amin)就曾指出:“专制统治带来了这样一个后果:强悍的男人歧视软弱的女人。……她在男人面前丧失了人格,世界之大,却只有家中隐蔽的角落才是她的容身之处。妇女被认为应该是无知的,应该蒙上黑暗的面纱。男人把她作为寻欢作乐的工具,随心所欲地玩弄,随时又可弃若敝屣。他可以发号施令,耳提面命;她只能唯唯诺诺,忍声吞气;他拥有这世上的一切,她只是这一切中的一小部分。”^[6]可悲的是,与面纱、头巾、多妻制、贞操罪有关的古老议题,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悬而未决;在阿拉伯世界的许多地方,妇女参与、男女平等依然是女性遥不可及的梦想。

认识阿拉伯思想与文化存在的痼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阿拉伯世界面临危机的

深层原因,还有助于我们判断当今阿拉伯巨变的意义,乃至预测巨变之后阿拉伯社会的走向。迄今为止,这场阿拉伯巨变的主要诉求,是争取改善民生,要求民主自由,推翻现行政权;巨变并未触及存在于阿拉伯社会的上述根本性文化与思想之弊,并未引起思想、文化层面相应的裂变,也远未形成一种全民参与的文化反思氛围。因此,我们在评价阿拉伯巨变的实际意义和客观效应时,极有必要考量这一因素。

二、巨变的文化反思

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阿拉伯世界正经历的巨变无疑有其积极意义。它推翻或动摇了专制统治,粉碎了政治强人不可撼动的神话,展现了人民、尤其是青年要求变革、引导变革的巨大愿望与力量。巨变打破了阿拉伯政治、社会由来已久的僵滞局面,为阿拉伯民族的进步提供了可能性。然而,这场政治裂变并未深刻而全面地冲击阿拉伯社会与文化的深层弊端,因而其积极意义有很大的局限性。欧美政界、学界看待变革的一种常见思维,是从“普世价值至上”的意识形态角度出发,过度渲染群众运动的“民主”与“革命”特性。他们在看待这场阿拉伯巨变时,也沿袭了这种思维。针对此种皮相之见,已有阿拉伯学者指出:“美国人和欧洲人看待阿拉伯变革的眼光是幼稚的,未能根据阿拉伯社会的文化结构与机制,了解事件与变故的本质。美国与欧洲的文化精英未能走出政治想象与分析,‘维基泄密’成了他们认识事件的最重要钥匙。除了屈指可数的少数分析,我们几乎见不到从历史与心理视角认识阿拉伯世界政治变革的文章。”^[7]事实上,在阿拉伯世界内部,在动荡发生以后的几个月内,对“阿拉伯革命”或“阿拉伯之春”的欢呼与喝彩,一直是主流媒体的基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态的发展,媒体上对变革自身的反思和质疑之声也日渐增多。或许,这些声音在当今阿拉伯舆论界还略显另类,但它对于我们客观、全面地了解阿拉伯巨变尤为必要。

有的阿拉伯学者意识到,这场变革的诉求主要局限于政治层面,这是一大不足:“自由作为一种至高价值,它理应涵盖生产与创造的一切领域,即包括思想、表达与信仰的自由。然而,阿拉伯革命提出的口号中存在一个问题:它把自由局限于政治层面,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层面……如果说,专制的国家代表了政治保守,那么阿拉伯社会则代表了思想与社会层面的保守,这正是当今的难题。问题超越了统治者下台与否,根本的问题在于如何在阿拉伯世界重新弘扬现

代价值。”^[8]阿多尼斯就阿拉伯巨变的局限性指出:“伊拉克的实践表明:仅仅摆脱现有的紧急状态法,摆脱可耻的审查和维安文化,摆脱腐败的政权及其下属机构和人员,还远远不够。仅仅改变统治者,变革不会成功。这种变革可能会带来较少腐败、较多智巧的统治者,但它不能解决造成腐败和落后的根本问题。因此,变革不应止于改变统治者,而应致力于改变社会,即改变社会的经济、文化基础。问题是:如何让变革从表面及于纵深,从形式过渡到实质?”^[9]他还尖锐地发出质疑:“今天阿拉伯大街上的示威者,是否正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认同一夫多妻制,只把宗教理解为许可、禁忌、责难,只用疑虑、排斥、回避、弃绝的眼光看待与自己见解不同的他者?这样的阿拉伯人能被称为‘革命者’吗?他们真的是在为民主和民主文化而抗争吗?”^[10]较之政治革命,更关键的问题是什么?阿多尼斯提出了这样的设想:“确立一种公民观念,建立一个公民社会,人们无论其宗教、种族和语言归属,都在这样的社会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建立一个法治及法治文化、自由与自由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而要建立这样的社会,首先必须全面地、根本性地审视15个世纪以来形成人与人之间关系、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一切基础。”^[11]

同样,如何看待阿拉伯社会的民主问题,也不只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关涉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的综合问题。沙特作家图尔基·哈麦德(Turki El-Hamad)指出:“民主不仅是选举和投票箱,它更代表了文化与社会价值观,理应在人们走进投票箱之前深入人心。这些价值观包括宽容、接受他者、承认选民的意愿,即使这种意愿让你失望。由于长期的专制统治,这些价值观在阿拉伯世界、在阿拉伯的政治文化中是匮乏的。”^[12]突尼斯思想家本·阿舒尔(Bin Ashur)指出:阿拉伯民主的问题在于,民主的理论与最高价值与伊斯兰社会的传统观念不符。根据伊斯兰神学,“大地上的城邦”应该置于教法的道德和法律之下,由根据宗教经典施政的国家管辖。“因此,神学和真正信奉自由与多元思想的民主是无法适应的。两者间只有暂时的、战术上的调和。”所以,“伊斯兰社会民主演进的障碍不仅是政治层面的,而且在根本上还与价值观念有关。因此,要建立相对性、多元化的民主理性,就必须撼动神学与教法的基本结构。”^[13]当前阿拉伯变革进程中遭遇的许多问题,为以上观点提供了现实的佐证。来自伊拉克的库尔德族作家哈立德·苏莱曼(Khalid Sulaiman)最近撰文指出,伊拉克库尔德城市苏莱曼尼亚

(Sulaimania)最近爆发的示威游行,可以视为埃及革命的翻版或缩影:当地的市中心也更为“解放广场”,在清真寺的政治性祈祷也成为每周的惯例,世俗知识分子也和伊斯兰宗教人士结盟,传媒上也有了“人民阵营”和“叛徒阵营”的区别性称谓,“革命者”也开始党同伐异,排斥异己。“谁不加入游行,谁谈论游行示威的不足和缺点,或谈论当前情形和法国1968年青年革命的巨大不同,就被视为脱离历史的叛徒、受雇佣者。”当地的伊斯兰组织秘书长在去年的伊拉克议会选举期间还曾扬言:“我们祈求真主惩罚那些不投票支持我们的人们”。^[14]

就民主是否适应当前的阿拉伯社会,人们一直看法不一,许多观点往往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烙印。值得我们参考的,是一些学者基于翔实、细致、全面的研究得出的学术成果。这些学者在长期跟踪全球各国政治制度的运作与演变之后,认为民主制度的成功与否取决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其中,民主政体的寿命,与国民人均收入有着直接关系,在人均收入处于1000美元至2000美元之间的国家,民主政体的平均寿命是16年;而在人均收入不足1000美元的国家,民主政体的平均寿命只有8.5年。这表明,在经济发展滞后的穷国,民主制度失败的几率很高。民主制度的成功还取决于政治传统,只有那些拥有政治多元化传统的国家,实行民主制度才比较顺利。另外,在族群矛盾复杂、国家认同薄弱的社会,实行民主制度也会格外困难。因此,从集权政治到民主制度的成功转型,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在条件不成熟的国家强行实行民主制度,不仅会影响民主的成效及维持,而且极有可能引发专制与暴力。^[15]由上述研究成果可以看出,阿拉伯国家大多呈现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专制制度历史漫长、文化传统保守落后、社会结构错综复杂的特点,这些国家在巨变之后能否成功过渡到民主制度,实在是需要打上巨大问号的。

巨变之后,原教旨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是否会在阿拉伯世界壮大,这是国际社会乃至阿拉伯各国自身十分关注的问题。在许多人看来,阿拉伯各国的专制统治者经常祭出原教旨主义这一“稻草人”,以抗拒来自国内外要求政治变革的压力。但是,巨变以来阿拉伯国家发生的一些事态表明,原教旨主义在巨变后勃兴于各国,极有可能成为现实。尽管“穆斯林兄弟会”等宗教组织在埃及等国的街头革命中刻意保持相对低调,但在巨变之后,这些宗教组织已日渐活跃,并逐步走向政治角力的前台。在埃及、突尼斯等国,宗教势力

对国家伊斯兰身份的强调,与城市中产阶级及知识精英要求建立政教分离的公民社会的诉求发生了冲突。埃及自称“赛来菲耶”(Salafia)的原教旨主义者在巨变后仿佛突然闯入人们的视线,他们声称对世俗主义信徒应该判罪,应强制所有妇女佩戴头巾,并制造了多起针对基督徒、什叶派、苏非派的暴力事端。在叙利亚,政府在局势动荡之初,就对宗教保守势力作出让步,废止了一项实行仅9个月的禁止教师佩戴面纱的法令,还关闭了该国惟一的赌场。在也门,妇女权益成了不同政治派别政治较量的牺牲品,不仅摇摇欲坠的萨利赫总统宣布妇女与男性一起参与示威游行违背教法,连反对派阵营中的“革命青年”,也对夹杂在游行队伍中的女性屡屡进行骚扰。对此,一位也门记者感慨道:“尽管‘革命时刻’打出了光鲜的口号,并迫使广场上的各种势力有所收敛,但这并不意味着歧视妇女、禁止男女混处的观念已经寿终正寝,因为歧视妇女的文化已经深深扎根于也门社会。显然,在不同党派的日程中,妇女自由只不过是一种‘政治涂料’,从未真正地付诸现实。”^[16]

巨变带给阿拉伯社会的另一隐忧,是宗派主义在多个国家死灰复燃。之前,阿拉伯国家内部的不同族群,虽也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但慑于政治强人的高压统治,各族群之间的矛盾一定程度上被掩盖或压制。在政治强人的权威受到严峻挑战的后巨变时代,宗派主义在民主的旗号下得以盛行。在利比亚和也门,政府与反政府人士间的政治冲突,与部落间的利益冲突不无干系。在巴林,执政的少数族群逊尼派与多数族群什叶派之间的教派矛盾,导致了激烈的流血冲突。叙利亚的严重动荡也具有教派冲突的某些特征,总统阿萨德家族所属的什叶派分支阿拉维派统治着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逊尼派,现政权曾在上世纪80年代对哈马市的宗教骚乱实行武力镇压,这成为许多逊尼派教徒心中一道无法抚平的伤口。埃及著名宗教人士、世界穆斯林学者联盟主席优素福·格尔达维(Yousuf El-Qardhawi)在叙利亚局势发生动荡之初就发表谈话,称:“叙利亚与其他国家相比,更应该发生革命……人民把阿萨德总统视为逊尼派教徒,但问题在于他成了自己的近臣和教派的俘虏。”^[17]这一言论激起叙利亚总统穆夫提艾哈迈德·哈松(Ahmad Hasoun)等宗教学者的强烈反应,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挑起教派冲突。在埃及,穆斯林和基督徒于今年5月7日晚在开罗城南的因巴巴(Imbaba)区发生了严重的宗教冲突,酿成12人死亡、232人受伤的悲剧。而自称“赛来菲耶”的原教旨

主义者也在巨变后兴风作浪,制造了教派冲突的诸多事端,如破坏多处苏非长老的陵墓,威胁拆开除罗旧城著名的什叶派圣地侯赛因圣陵和宰乃白夫人圣陵,一位教士甚至要求教徒“拒绝同基督徒握手,拒绝向他们主动问候,不允许基督徒在穆斯林前面行走。”^[18]对此,许多有识之士忧心忡忡,认为宗派主义的膨胀可能断送阿拉伯革命取得的所有成果。

上世纪90年代初,埃及文学大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吉布·马哈福兹(Nabuib Mahfouz)接受友人访谈时,曾对纳赛尔领导的1952年革命作过一番议论:“1952年革命胜利后,埃及人民突然发现:他们的领袖是自己人,是平民百姓的儿子,而且充满了爱国热情。于是,再没有必要闹革命反对政府了。最初,他内政外交的一切举措都令人称道,于是人们支持他,拥护他。但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发现专制的统治方式并没有改变,于是重又回到听天由命、与世无争的状态,延续了七千年的老毛病复发了。”^[19]在埃及又一次革命爆发后的今天,回顾马哈福兹的这番谈话,人们不禁会感慨万分地联想起现实。不久前,阿拉伯许多媒体都转载了路透社4月29日的一则评论,其中写道:“今年2月穆巴拉克总统被赶下台的时候,千百万埃及人认为,摧毁了他30多年统治的腐败和停滞也将结束。然而,两个多月过去之后,有些人改变了想法。那些因高物价、失业、腐败而感到失望的人们,曾经走上街头,要求民主,呼吁变革。可至今,他们的生活几乎没有变化……有些埃及人已经开始质疑:还要等待多久?”^[20]

三、结语

关于革命的一切,今昔何其相似。这是历史的轮回?埃及和阿拉伯民族能否跳出历史的怪圈?令人遗憾的是,阻碍阿拉伯民族进步的诸多根本性积弊,在这场政治巨变中并未受到冲击和革除;诸多迹象表明,阿拉伯变革的走向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前景并不令人乐观。然而,阿拉伯民族毕竟已踏上没有退路的变革征程。他们走出的是通衢,还是畏途?答案取决于阿拉伯人民的行动。让我们拭目以待。

[注释]

- [1] [叙利亚]阿多尼斯:《有关阿拉伯文化原教旨主义的三个问题》,载《语言的头颅,沙漠的身躯》[M],贝鲁特萨基出版社,2008年版,第212页。
- [2] [叙利亚]穆斯塔法·希贾兹:《社会落后:受压抑者心理》[M],贝鲁特阿拉伯发展学院,1989年版,第145页。
- [3] 《当代阿拉伯思想观照下的阿拉伯思维》[J],科威特《阐明》(Albayan)杂志2002年9月刊,第18页。
- [4] [突尼斯]阿费夫·艾赫达尔:《夸大对身份的威胁有碍实现政治现代化》[N],伦敦《生活报》2000年5月4日。
- [5] [叙利亚]亚辛·哈只·萨利赫:《作为政治控制战略的宗派主义》[J],贝鲁特《文学》杂志2007年第6期。
- [6] [埃及]卡西姆·艾敏:《解放妇女》,转引自《思想的金字塔》[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 [7] [14] [伊拉克]哈立德·苏莱曼:《革命的翻版与社会问题》[N],伦敦《生活报》2011年4月29日。
- [8] [突尼斯]阿迪勒·拉提费:《现代化语境下的阿拉伯革命》,半岛电视台网站, <http://www.aljazeera.net/NR/EXERES/DB6C8942-BEFF-42A8-961C-12CE66086089.htm>。
- [9] [10] [11] [叙利亚]阿多尼斯:《叙利亚时刻》[N],伦敦《生活报》2011年3月31日。
- [12] [沙特]图尔基·哈麦德:《关于民主和阿拉伯人民革命的前景》, <http://www.darblrl.com/vb/showthread.php?t=23269>。
- [13] [阿联酋]《现代化语境下的阿拉伯革命》[N],阿联酋《联合报》2011年3月14日。
- [15] 对上述研究成果的综述,参见: <http://danielberhane.wordpress.com/2011/02/02/arab-revolt-are-they-ready-for-liber-al-democracy>。
- [16] [也门]阿里·萨里姆:《压制也门妇女:在现行政权和革命者的眼中》[N],伦敦《生活报》2011年4月28日。
- [17] [埃及]《格尔达维:叙利亚人民把阿萨德总统视为逊尼派教徒,但他成了阿莱维派的俘虏》[N],埃及《华夫脱报》2011年3月26日。
- [18] [巴勒斯坦]杰哈德·哈津:《他们是埃及的未来吗?》[N],伦敦《生活报》2011年5月2日。
- [19] [埃及]纳吉布·马哈福兹:《自传的回声》[M],薛庆国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177页。
- [20] Miral Fahmy, “Graft, stagnation persist in post-Mubarak Egypt”,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1/04/29/us-egypt-future-idUSTRE73S1RM20110429>。

作者简介:薛庆国,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副主任,教授。(北京,100089)

收稿日期:2011-05-30

修改日期:2011-07-06

premise that can be called American Centralism or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underlying the soft power discussion. To wit, the soft power argument comes down to the premise that the American soft power resources are indicative of universal values so they are of undoubted attraction. In fact, it is the different positions on this premise among scholars in China and abroad that have led to the apparently opposite views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ft power.

World Economy

56 Northeast Asia's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Low Carbon Economy

by Gu Xiaocun

In order to control global warming, developing a low carbon economy featuring low power consumption and low pollution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from the world and becomes a new challenge to regional cooperation.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low carbon economy has provided a new perspective and new request for strengthening Northeast Asian regional cooperation. This paper is dedicated to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w carbon economy and cooperation within the region of Northeast Asia, and the basis, as well as the related variables of such cooperation. On the basis of analysis, this paper will put forth the strategic plan for the cooperation of Northeast Asia with focuses on low carbon economy, and try to determ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del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of low carbon economy as accurately as possible.

Countries and Regions

62 Great Changes in the Arab World: A Cultural Perspective

by Xue Qingguo

The great changes that have swept and are still sweeping the Arab world, are caused by the deep crisis facing modern Arab society. It is not enough to view the Arab crisis from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erspectives. It should be recognized that several serious defects inherent in Arab thought and culture constitute the deep roots of the current crisis. So far, the Arab street's appeals have been confined mainly to seeking political changes, without causing serious pounding on the deep maladies of the Arab thought and culture, so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the Arab revolution are limited. The Arab intelligentsia has started to reflect on the limitations and problems of the revolution. There are many uncertainties awaiting Arab's future and people should not be too optimistic about the prospect of the current changes.

67 The Influence of Change of Demographic Structure on U. S. Presidential Election

by He Xiaoyue & Xu Kaiyi

Changes of American demographic structure mainly cover population of different groups,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population age, social status, religious identification and partisanship. These changes lead to the change of relative power of different groups in election,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two parties' electoral base, the change of characteristics of electoral politics, and will further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future of the two parties.

72 Analysis of the Overflow of North-East India's Secessionist and Terrorist Activities to the So-called "Arunachal Pradesh"

by Li Jinke & Ma Dexun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India, there have been serious secessionist and terrorist activities in its northeast states. The Eastern Section of Sino-Indian Disputed Territories (We call it the southern Tibet, while India named it "Arunachal Pradesh") is adjacent to the states of northeast India, so its security situation has been directly influenced by northeast India's secessionist and terrorist activities. Under the influences of geographical, ethnic and economic factors, secessionist groups in northeast India have come into the so-called "Arunachal Pradesh", such as the National Socialist Council of Nagaland, the United Liberation Front of Assam, etc. In recent years, the activities of secessionist and terrorist groups in the so-called "Arunachal Pradesh" are becoming more frequent, which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social stability of the disputed area.